

魏晉

五言詩研究

Weijin Wuyanshi Yanjiu

王今暉 著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
于會稽山陰之蘭亭

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

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

流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

魏晉
五言詩研究
Weijin Wuyanshi Yanjiu

王今暉 著

青島大學東亞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學術叢刊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魏晋五言诗研究 / 王今晖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 - 7 - 5004 - 8635 - 0

I. ①魏… II. ①王… III. ①五言诗 - 文学研究 - 中国 - 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①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4313 号

责任编辑 曲弘梅

责任校对 周 昊

封面设计 弓禾碧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9.5 插 页 2

字 数 255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张可礼

今晖的《魏晋五言诗研究》，本来是他的博士论文。论文在2004年5月顺利通过了答辩之后，今晖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继续阅读覃思，从容涵味，不断修改。经过五年多的努力，同原来的论文相比，在不少方面有了新的进展和提高。应当说，这是魏晋五言诗研究的一部力作。

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五言诗取代四言诗是诗歌体式的一次变革，一次飞跃。魏晋是五言诗的奠基时期。五言诗经由魏晋的奠基，从此以后，蓬勃发展，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富有生命力的一种体式。要研究五言诗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魏晋是一个重要关节。五言诗是魏晋诗坛上用得最广泛、成就最突出的一种诗体。研究魏晋文学，特别是研究魏晋的诗歌创作、诗学思想，五言诗都占有首要的地位。可能主要是由于上述原因，所以自魏晋以来，不少文人学者相当重视研究魏晋的五言诗，相继留下了一些重要论著。这些论著，大致有两类：一类散见于综合性的论著中，呈散点状态；一类则比较集中。这些论著，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魏晋的五言诗进行了探讨，多有见地，值得我们护惜和借鉴。不过以前的论著，囿于当时的种种条件，或欠全面系统，或显得比较简略。尤其是对五言诗在艺术表现上的诸多特点，如声韵、句章、修辞、意象等方面，未及作深入、细致的探讨。这就给后人留下了一些研究的空间和余地。时代的前进，学术的发展，需要我们对魏晋五言诗继续探讨。正是基于上述的思考，今晖选择了“魏晋五言诗研究”这一课题。应当说，他的选择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

史料是研究的基础。对这一点,今晖有自觉的意识。他在研究魏晋五言诗的过程中,始终重视史料。课题确定以后,他围绕课题,全面地搜集、阅读、掌握了有关的背景史料、传记史料、诗歌作品史料和研究史料。在上述史料中,诗歌作品史料是核心。今晖对诗歌作品史料的阅读思考,费时很长、用心更多。诗歌是字字作,今晖对魏晋的五言诗可以说是字字读,对作品有相当深入细致的体悟和理解。今晖对史料的重视,使论文中的论述能够建立在比较扎实的史料的基础上。

以前探讨魏晋五言诗,有的主要是基于历史的发展,取纵向的视角;有的主要是以问题为中心,取横向的视角。今晖的论文尝试用纵向和横向两个视角,纵横结合,先纵后横,建构了自己的体系,对魏晋五言诗作了相当全面、系统、深入的探讨。在纵向上,首先在“引言”中,从长时段的角度,论析了五言诗体的确立及五言诗形成的原因,接着在上编“发展论”中,分建安、正始、西晋和东晋四个阶段,对魏晋五言诗作了动态的述评。在横向上,主要着眼于魏晋五言诗的艺术表现,从声韵、句章、修辞和意象四个方面,探讨了魏晋五言诗在艺术表现上的主要特点。论文不论是在纵向上,还是在横向上,都有一些自己的体悟和见解。如:论五言诗形成的多元的、复杂的原因时,特别强调起关键作用的是合文思维方式以及由此导致的双音词的大量产生。五言诗从产生到确立经过了一段缓慢的历程,个中原因也是复杂的。其中有三点尤其重要:一是汉语词汇的双音化,是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二是五言诗生发于民间歌谣谚语,依托乐府而发展,但乐府又长期处于“俳谐倡乐”的地位;三是汉代文人功利主义的诗学观和《诗经》的经学化,束缚了文人的创新意识。论文论述西晋五言诗,指出:西晋的诗歌重在言情。这些言情的诗歌,使用的主要是五言诗体式。西晋的五言诗扩大了言情的范围,抒情功能得到了加强,在艺术表现上也有很大的提高。论文探析了魏晋五言诗在声律、字法、句法、章法和对偶艺术上的特点。认为:西晋时期五言诗粘式律结

构的增加，东晋五言诗篇幅上的趋短以及完全合律的绝句的出现，在创作实践上为南朝沈约声律说的提出创造了条件。在字法上，魏晋五言诗大量使用叠字与双声叠韵字，丰富了艺术表现力，体现了魏晋诗人观察外物的细致和驾驭语言的能力。魏晋的五言诗常常使用虚字。有些虚字与单音词结合形成双音节，起到了调整五言诗节奏的作用。有些直接以双音词的形式出现，增强了五言诗的节奏韵律。有些虚字有时作为独立的单音节出现在五言单句第一字或第三字的位置上，起到了加强语气的作用。在章法上，魏晋五言诗的最大特点是主题突出，结构完整，重视诗歌的完整性，尤其是层次间横向间的联系。上面列举的例证，立论有据，不蹈空言，分析细致，可备一说，有助于人们阅读和理解魏晋五言诗。

今晖于1995年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至今一直在青岛大学中文系任教。2001年考取了山东大学古代文学在职博士研究生，2004年毕业。他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心无旁骛，潜心研究，还继续担任教学工作。多年来他重视做人，注意厚德。在学业上，有敬业之心，无出位之思。无论是在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上，还是在研究上，都尽心尽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我作为他的博士研究生的指导教师，能遇到这样一位学生，感到十分欣慰。今晖有很好的基础，有进取的心态，又富于春秋，我期待着他在弘扬我们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方面，取得更大的成绩。

2009年10月23日

前 言

五言诗从秦汉时期产生^①，历经魏晋南北朝，至唐宋而蔚为大观，成为中国古代重要的诗体形式之一。如果说唐代是五言诗的成熟、鼎盛期，两汉是五言诗的出现、形成期的话，那么魏晋南北朝四百年无疑是五言诗的奠基、发展期。通过和其他诗体相比较，可以看出这几个时期五言诗在诗坛所占据的位置。两汉时期出现了一些较好的文人五言诗，甚至有《古诗十九首》这样温丽悲远的佳作，但五言诗在当时并不是主流诗体，雅正的四言诗占据着诗坛的主导地位，五言诗无论从作者群体还是创作数量上来说，都没有超过四言诗。唐代完成了诗歌的近体化进程，五言诗在声律韵调的把握、表现技巧的灵活、艺术风格的多样等方面，都远胜于前代，但唐代的七言诗也已发展成熟，其数量和成就堪与五言诗平分秋色，甚至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与这两个历史时期不同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处于四言衰落，七言未盛，楚歌近于消亡的时代，五言自然成了创作群体最为广泛，创作规模最为宏大的一种诗体，当然也是最具生命力的一种诗体。可以说，这个时期诗学观念的进步、诗歌题材的丰富、表现技巧的提高以及艺术风格的形成，无不与五言诗的发展息息相关。只有掌握五言诗体独特的艺术特征，理清五言诗发展的进程，才能把握住此期诗歌整体的发展规律。同时，这时期特有的哲学和社会思潮、文学风气乃至宗教义理的影响，使五言诗的发展呈现了较为复杂的局面。因此，对于发展期五言诗的研究，

^① 由于对五言诗体的界定不同，导致五言诗产生时代问题歧见迭出，这里是以现存最早的完整五言诗为依据而下的结论，具体论述参见本书“引论”部分。

是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课题。

魏晋南北朝作为五言诗的奠基、发展期，事实上包括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即魏晋时期和南北朝时期。我们姑且将其称作五言诗的前发展期和后发展期。之所以分成这样两个时期，是因为二者在许多方面有明显的差异。首先，文化背景的不同。钱志熙先生把这两个时期分别看做两个诗歌艺术系统，着重指出二者的音乐基础不同：“前者是以源于战国的汉魏音乐系统为母体，后者则是以晋宋齐梁的南方民间音乐系统为母体。”^① 这是从诗歌的音乐母体的不同而发论的，也可以视之为文化背景的差异。其次，诗歌艺术风貌的不同。朱光潜先生曾将《古诗十九首》到陶潜这一汉末魏晋时期看做中国诗转变的第一大关键，并以乐府五言的兴盛作为标志，而认为谢灵运和“永明诗人”以后的诗歌，“最大特征是丢开汉魏诗的浑厚古拙而趋向精妍新巧”^②。的确，诗歌发展到南朝元嘉时期，发生了太多的转变，有关这一点，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均有论及。其后的永明文学思潮，更是以声律理论为核心，将诗歌带入了近体化发展道路。即便如此，我们必须看到，两个历史时期诗歌的发展依然有一条割不断的血脉在连接着。诚如罗宗强先生所言：“从大的脉络考察，它（南朝）一直是沿着自建安开始的重文学特质、重抒情、重文学形式的探讨的方向发展的。”^③ 无论对于魏晋五言诗还是南北朝五言诗的研究来说，这必须是认识上的一个基本前提，当然也可以说是研究的最终归宿。

基于上述认识，本书以魏晋五言诗为研究对象，意在厘清五言诗自两汉形成以来，在魏晋时期究竟沿着怎样一条路线在发展，影响它发展的因素究竟有哪些，这些因素又给五言诗带来了哪些变

① 钱志熙：《魏晋诗歌艺术原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② 朱光潜：《诗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78页。

③ 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72页。

化。同时，这些研究并没有局限于魏晋这个阶段，而是充分考虑到五言诗在之前的两汉时期的发展状态，以起到正本清源的目的，至于南朝时期五言诗所出现的新局面，也给研究工作树立了一个清晰的坐标，使我们的研究更有指向性。

在本书构思之初，如何确定研究的角度，还是颇费一番思量的。五言诗既然在两汉时期形成，而汉魏相接，后者对前者的承继是非常明显的，那当然有必要将五言诗在两汉时期的形态呈现出来。现存汉代五言诗主要有三类，即民间谣谚、乐府歌诗和文人诗，通过分析发现，三类诗歌大体构成了五言诗的一个形成过程。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些困扰学界已久的具体问题，如关于有些文人五言诗的真伪问题、乐府歌诗产生的具体时代问题等，都是不能回避而又不容易说清的。此外，五言诗为什么会在汉代形成，也是要拿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的。这些问题都权且放在“引论”部分来加以说明吧。五言诗作为一种诗歌体式，其研究角度自然应偏重于其诗体形式方面的特征，这一点同样适用于魏晋时期的五言诗，本书下编主要就是以此为着眼点，以“表现论”为题，从横向的角度，对魏晋五言诗艺术形式的发展进行深入研究。立足于诗歌文本，运用传统的诗学理论，结合相关学科的分析方法，主要从四个方面来进行论述。在声韵篇中，着重分析声律和用韵情况；在章句篇中，对字、句、章方面进行全面考察，尤其是前人较少论及的起、结句艺术和组诗艺术；在辞格篇中，仅就魏晋五言诗中最常见的比兴、对偶和用典这三种手法作了分析；在意象篇中，对魏晋五言诗的意象类型、意象组合、意象功能等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然而，与齐梁以后的五言诗相比，魏晋五言诗无论在诗学理论的发展，还是在诗歌形式的新变方面，都还显得不够突出。而且这时期各种社会因素哲学思潮乃至文学思想，都对五言诗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基于这种情况，若单纯从诗体形式方面来研究魏晋五言诗，显然有些单薄，甚至片面。因此本书上编以“发展论”为题，从纵向的角度，对魏晋时期各个阶段、各个诗人五言诗的创作情况，作出详细

统计和总结。着重探讨五言诗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过程中,受到的诸如社会环境、哲学思潮、诗学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力求从宏观上把握五言诗的发展情况。

需要补充的是,确定以魏晋五言诗为研究对象,主要还是基于目前学界的研究局面。对于包括诗歌在内的魏晋文学的研究,在过去多集中在建安文学和一些重要作家,如三曹、阮籍、陶渊明等人的个案研究上,老一辈学者筚路蓝缕之功,有目共睹;近些年来,又多从文化学的角度着眼,围绕某一具体问题作纵深研究,成绩斐然,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在包括诗歌在内的魏晋文学研究走向多角度、多层面的同时,学界相对忽略了对文体本身发展状况的研究,或者说少有从文体的角度来研究魏晋文学的论著出现,至于四言诗、五言诗等诗体发展的研究著作则少之又少^①。至于南朝五言诗的研究,近些年学术成果较多^②,所以本书没有将其纳入研究范围。

本书的研究是在对现存两汉魏晋时期的全部五言诗进行认真解读的基础上,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细致的梳理,在具体的论述中,主要采用考证和阐释相结合的方法,适当结合了统计学、语言学(音韵学、语法学、修辞学)和文艺美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力求在尽可能的范围内丰富研究手段。

① 就笔者所见,此类著作有王次澄的《两晋五言诗研究》,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76年;[韩]崔宇锡:《魏晋四言诗研究》,巴蜀书社2006年版。

② 如何伟棠:《永明体到近体》(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阎采平:《齐梁诗歌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吴小平:《中古五言诗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等。

目 录

序	张可礼 (1)
前言	(1)
引论 五言诗的形成	(1)
一、五言诗体的确立	(1)
二、五言诗形成的原因	(29)

上编 发展论

第一章 “五言腾踊”的建安诗坛	(39)
第一节 五言诗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40)
一、五言诗的普遍运用	(40)
二、题材的开拓创新	(42)
三、抒情、言志及二者的结合	(47)
第二节 “五言腾踊”的形成原因	(53)
一、在继承中创新——汉代五言诗的影响	(53)
二、文学观念与文化氛围的促进作用	(60)
第二章 鸾鹤双飞的正始诗坛	(65)
第一节 正始五言诗发展概况	(65)
一、嵇康等人的五言诗	(66)
二、阮籍的五言《咏怀诗》	(74)
第二节 玄学影响与五言诗创作	(76)
一、玄学与五言诗主题的变化	(77)
二、玄学思想方法入诗及五言诗的哲理化	(82)

第三章 “勃尔复兴”的西晋诗坛	(87)
第一节 西晋五言诗创作概况	(88)
第二节 “缘情”、“感物”说的确立	(90)
第三节 西晋五言诗言情的主题取向	(95)
第四节 尚绮靡的诗学理论与五言诗的创作实践	(103)
第五节 五言诗中的摹拟倾向	(108)
第四章 继轨风流的东晋诗坛	(113)
第一节 东晋五言诗创作概况	(114)
第二节 郭璞与《游仙诗》	(118)
一、郭璞在东晋初期诗坛上的地位	(118)
二、《游仙诗》对诗境的开拓	(122)
第三节 五言诗中的山水与玄佛义理	(125)
第四节 陶渊明与五言诗的新局面	(132)

下编 表现论

第一章 声韵篇	(139)
第一节 魏晋诗人对声韵的探索	(140)
第二节 魏晋五言诗声律分析	(147)
第三节 魏晋五言诗韵式分析	(157)
第二章 句章篇	(166)
第一节 魏晋五言诗的字法与句法	(167)
一、魏晋五言诗的字法	(167)
二、魏晋五言诗的常见句法	(175)
第二节 魏晋五言诗的篇章结构	(181)
一、起句和结句艺术	(181)
二、布局谋篇艺术	(188)
三、组诗的内在机制与艺术魅力	(192)
第三章 修辞篇	(198)
第一节 魏晋五言诗的比兴艺术	(198)

一、比喻的修辞艺术	(199)
二、比拟的修辞艺术	(204)
第二节 魏晋五言诗的对偶艺术	(205)
一、二元思维与五言诗出现前的对偶艺术	(205)
二、魏晋五言诗对偶的主要形式	(207)
三、对魏晋五言诗对偶艺术的几点认识	(213)
第三节 魏晋五言诗的用典艺术	(218)
一、诗歌用典的出现及其发展	(218)
二、魏晋五言诗用典的主要来源和基本方法	(220)
三、魏晋五言诗用典具体情况的分析	(223)
第四章 意象篇	(228)
第一节 魏晋五言诗的意象类型	(231)
一、自然意象	(231)
二、人文意象	(234)
第二节 魏晋五言诗的意象组合	(237)
一、句的意象组合	(238)
二、篇的意象组合	(239)
第三节 魏晋五言诗意象功能分析	(244)
一、作为艺术手段的隐喻功能	(245)
二、意境的创造	(248)
结语	(251)
主要参考书目	(254)
附录	(260)
后记	(291)

引论 五言诗的形成

一、五言诗体的确立

现知最早探求五言诗起源问题的是晋代的挚虞，《艺文类聚》引其《文章流别论》云：“五言者，‘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之属是也，于俳谐倡乐多用之。”^①这两句诗出自《诗经》中的《召南·行露》。可见，挚虞已将五言诗的起源远溯至周代。其后，刘勰和钟嵘也都发表了类似的见解。《文心雕龙·明诗》云：“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②《诗品·序》云：“夏歌曰：‘郁陶乎予心’；楚谣曰：‘名予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略是五言之滥觞也。”^③如果我们从文体学的角度来严格审视这一问题的话，上述诸人的观点无疑是存在偏颇的，从他们所引诗作来看，若作为五言诗句的起源是有道理的，但作为五言诗体形式的滥觞，则不免牵强。这些诗作或是含有五言诗句的杂言体，或是带有“兮”字的楚歌体，都不能视为五言诗。含有五言诗句的杂言体与完整的五言诗体有本质的区别，即便一首杂言诗主要由五言句式构成，也不能看做五言诗；楚歌中的“兮”字即便没有实际意义，但它至少在节奏上占据了半拍，也不能忽略不计。

这就自然引出了五言诗体的辨别标准问题。逯钦立先生曾说过：“凡称五言诗，须通篇皆为五言，一也。凡称五言诗，不得含

① （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五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②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6页。

③ 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

有兮字，二也。”^①这两个标准可以说是界定五言诗的一个前提条件。还需要说明的是，完整的五言诗体的出现，应该是在明确的诗体意识的支配下完成的，而这种意识的由来则是需要特定条件的，先秦时期这种条件并不成熟，所以也就没有产生完整的五言诗。现存无论较为可靠还是尚有争议的完整五言诗，都是在秦代以后出现的，更加说明了五言诗的源头，最早也只能追溯到秦汉之际。另外，由于现存五言诗有许多残篇，有些诗甚至只有两三句，不易确定原诗是否为五言诗，为了便于整理和研究，只能选择一个较为折中的做法，即所有五言诗必须在四句以上。

此外，判断一种诗体在何时确立，不能简单地以第一首诗的产生时代为标准，还需要考虑到这种诗体的使用范围，人们对它的接受程度，以及诗体形式的相对稳定性等种种因素。可以说，这是一个相对较为漫长的历史时期。五言诗体是在两汉时期逐步形成的，这离不开民间创作和文人群体的共同努力。现存汉代五言诗主要有三大类，即民间谣谚、乐府古辞和文人诗，这些诗歌是我们分析这一问题的主要文本依据。

（一）五言诗肇始于民间谣谚

现存最早的五言诗，存在于民间谣谚一类诗歌中。现依产生时代的先后顺序，列举并分析如下：

1.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三《河水》云：“始皇三十三年，起自临洮……民劳怨苦，故杨泉《物理论》曰：‘秦始皇使蒙恬筑长城，死者相属，民歌曰：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其冤痛如此矣。’”^②这首民歌是现今所能看到的最早的一首五言诗。杨泉是三国吴、晋间学者，《物理论》共十六卷，今已亡佚，《隋书·经籍志》入儒家类。从这部书的性质来

① 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4—55页。

② （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7页。

看，应该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其引文当是较为慎重的。不可以作者非秦汉时人，便怀疑这首歌谣的真实性。歌谣共有四句，与当时的同类作品在篇幅上大体相当，所以也不会是残篇。至于曹魏时期陈琳《饮马长城窟行》中的“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①，显然根据秦时的这首歌谣加工而成。首先，“君不见……”语气连贯自然，中间加上一个“独”字，诗句的意义并没有得到扩张，又影响了语气的连贯，合理的解释是“君独”放在“不见长城下”前面，是为了凑足七言句式。其次，“尸骸”语言凝练、意义完足，而“死人骸骨”则稍显烦琐，有对“尸骸”一词拆开来说的倾向。虽然可能是为了增强诗歌的口语色彩，但更像是为了凑齐句式而然。陈琳这样调整句式，也可能是出于入乐的需要。总之，调整后的句式，使全诗达到了错综起伏的艺术效果。由此可见，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不能作为怀疑这首秦代五言歌谣真实性的证据。

2. 《汉书·贡禹传》记载贡禹给汉元帝上书，言及汉武帝时代郡国欺上瞒下、破坏纲纪的现象时，引用了武帝时代的一首俗语：

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仪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②

这首俗语因为对时事有较强的概括力，而被贡禹引用在奏书中。连续使用三组句式相近的设问句，语气连贯而富于讽刺意味。

3. 《汉书》卷九十《尹赏传》记载汉成帝永始、元延年间长安歌谣：

① 郁贤皓、张采民：《建安七子诗笺注》，巴蜀书社1988年版，第153页。

② （汉）班固：《汉书》卷七十二《贡禹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安所求子死（尸），桓东少年场。生时谅不谨，枯骨后何葬。

这是尹赏任长安令时，为整治长安的轻薄少年恶子一类人，动用酷刑坑杀数百人，“瘞寺门桓东”^①后，长安市井流传的一首歌谣。该歌谣节奏鲜明，韵律协调，亦颇富训诫味道。

4. 《汉书》卷二十七《五行志》还记载了汉成帝时的一首歌谣：

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桂树华不实，黄爵巢其颠。故为人所美，今为人所怜。

前四句巧用比兴，类于隐语，取喻于现实生活，意象质朴而生动；最后两句运用对比手法，揭示出今昔不同的命运，刚要展开，却又戛然而止，颇耐人寻味。从用韵来看，汉代真、先两部音值比较接近，真部当中还有一部分先韵的字，这种情况到曹魏时期还不同程度存在。这首歌谣不仅首句入韵，而且韵脚皆平声，十分齐整。

5. 《后汉书·樊晔传》载，光武帝时樊晔为天水太守，政严猛，“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狱”^②。凉州人为樊晔作歌曰：

游子常苦贫，力子天所富。宁见乳虎穴，不入冀府寺。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见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

这首歌辞为五言八句，不仅篇幅上超过了此前的作品，而且中间四句两两对偶，句式整齐划一，用去声宥、志韵，也与内容相得

① 《汉书》卷九十《尹赏传》。

②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七《樊晔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